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4年08月刊

总第72期



**P01 卷首语：**

**邬大光：高等教育学如何走向“成熟”**

# 目录 Contents

## 卷首语

- 01 高等教育学如何走向“成熟” 邬大光

## 院长视点

- 21 陶行知：世界教育大师  
23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 专家观点

- 26 教育是“硬”的软实力 马陆亭  
29 陶行知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思想与实践研究 申国昌  
37 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应用中的伦理、包容与公平 付卫东  
43 中国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黄艳

## 院内动态

- 56 我院周洪宇院长受邀参加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建系一百周年系列讲座  
58 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和博士生常顺利合作的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  
60 申国昌教授和博士生白静倩合作的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  
62 刘来兵教授与硕士生杨若怡合作论文被《教育学文摘》摘编



欢迎与我们互动

## 高等教育学如何走向“成熟”

来源 | 《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05期



邬大光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高等教育学是我国独有的学科，经过第一代高等教育学人的努力，高等教育学获得了“合法性”的学科身份，走过了一段学科的“辉煌”，形成了国际上独有的学科建制和庞大的研究队伍以及相对丰富的资源配置。虽然高等教育学在我国经历了“学科”“研究领域”“院

校研究”的多年之辩，但学人已普遍认识到这些讨论既没有生发出具有明显区别的独有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实际的贡献。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价值不断彰显，在我国被视为整个教育体系的“龙头”。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也给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压力。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亟需高等教育学给予回答。高等教育学能否承担起这一使命，不得不引起高等教育学人的思考。

### 一、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吗？

高等教育学在我国已有40年的学科史，在当下如果说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恐怕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它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社会需求。如果说它是一个“无用”的学科，显然遮蔽了它40年的存在价值，既不符合它在国内作为学科作出的贡献，也不符合它在国外作为研究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说它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似乎可以让人接受，因为高等教育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面临着类似的发展困境。但也可以看到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社会各利益主体对高等教育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期许，也有实践上的需求。实际上，高等教育学走到今天依然是一个“正在发展、有待提升和有待成熟的学科”。

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得益于我国独有的学科建设制度。在我国，学科地位对于任何学科的生存与发展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学科地位，既难以在体制内获得认可，也难以从体制外获得资源，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就无从谈起。正是在学科建制的“庇护”下，高等教育学才能迅速成为“土生土长”的学科，才有了相对稳定的学科地位，才有了学科的影响力。高等教育学的产生和演进过程，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是罕见的，在世界上是独特的，其作用和贡献是可以感知的。

高等教育学发展到今天，基本具备了学科建制和规训所包含的一切要素，包括人才培养单位、学术研究组织、专业出版物和学位



授予点等一应俱全。在许多高校既有独立建制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有依附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机构，还有与学校规划等职能部门融为一体的研究机构。诚然，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形式和架构的不同，使得学科在学校的地位完全不同。尤其在我国的学科评估从二级学科转向一级学科的过程中，一些院校的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依附于公共管理或管理科学等学科时，其“存在感”普遍偏低，几乎难以获得很好的发展空间。高等教育学在一所高校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水平，与其学科是否独立设置直接相关，只有获得相对的独立建制，才能成为稳定的学科。

高等教育学发展到今天，其理论张力得到了释放，学科的外溢效应日益彰显。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已渗透在国家宏观政策制定和高校内部治理的方方面面，它不仅为各级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还对高校的内部治理提供了改革思路和建议。实际上，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最初都产生于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尔后从高校内部走向高校外部，最后再回归到高校内部治理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类型还是研究范式和方法以及研究领域和主题，都在发生变化。例如，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上，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和转向“院校研究”的机构不断增加；在研究范式上，从关注思辨和引进西方理论到关注中国问题；在研究领域上，从关注宏观开始转向宏观微观并重，其研究范围和主题与时代的契合性不断增强，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流学科建设、高等教育普及化、教育公平等。

然而，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在建制上相对成熟的学科，并不代表学科“内涵”的成熟，也不代表理论体系的成熟，更不代表研究视野和水平的成熟，只能说是学科“形式”的成熟。高等教育学能否达到成熟？对于高等教育学人来说，回答当前高等教育学的“成熟”或“不成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自高等教育学作为学科建立以来，既有构建“中国式”自主知识体系的不足，也有在引进西方

理论时的消化不良，以及在解读过程中的“泛化”和“窄化”，还有不同管理部门在实践中的“误用”，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时出现“生存”或“信用”危机。尽管有种种的不成熟现象，但高等教育学的存在价值不容否认，这些不成熟既是一个年轻学科发展的过渡阶段，也是走向成熟的必然阶段。正确认识和反思这些不成熟是走向成熟的起点，对于寻找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的路径至关重要。

一般而言，成熟的高等教育学应该具备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即我国新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所要求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实现三种功能。其一，用理论能够解释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高等教育实践问题；其二，用理论能够指导具体的高等教育实践；其三，用理论能够引领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因此，成熟的高等教育学理应能够对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说明和总结，解释客观存在的现象或事实“是什么”和“怎么样”；能够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能够以前瞻性的预判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三种认识来评判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成熟，可以形成如下结论。

高等教育学对实践的解释力开始下降，既表现为无法回答和解释高等教育实践领域不断涌现的“新”现象，也无法回答和解释实践领域出现的“特殊”现象。今天的高等教育活动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出现了许多超越传统高等教育学关注的现象，如创新创业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第一代大学生、非传统大学生、应用技术型大学、盈利与非盈利等。这些新概念或新事物的出现，打破了原有高等教育学的认知。而高等教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运用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去认识和解决高等教育中的问题，同时要有一部分基础理论研究，用以指导高等教育活动”。高等教育学作为理论体系，其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及时回答这些新问题，形成新理论。高等教育实践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在精英化时代遇到的问题与大众化

时代完全不同，在大众化时代遇到的问题与普及化时代完全不同，在市场经济国家遇到的问题与计划经济的国家完全不同。此外，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学无法解释实践领域的“特殊”现象，以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为例，大众化理论原本是对西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现象的一个描述，但未经修正就在我国被奉为“圭臬”，当我国把一个“预警”理论当成目标理论看待并运用时，理论也就“失真”了，既违背了提出者的本意，也与事实不符，使得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推进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高等教育学对微观的实践指导效果不明显。高等教育学的任务之二是指导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一般而言，所有的教育研究都有一个或两个目的，即知识的拓展和问题的解决。”前者指的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后者指的是面向实践的指导。从现实看，自高等教育学有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之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题与微观实践层面的联系似乎度过了“蜜月期”，更多地转向宏观政策或“热点”研究，高等教育学人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个人的“学科偏好”，与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之间的联系出现了断裂。例如，高等教育学对国家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难以发挥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了众多人才培养试验班，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北京大学元培班等，在这些实验班里几乎看不到高等教育学人的身影和作用。在今天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者只能根据文本数据来分析这些实验班的成就与问题。相反，到了申报各级教学成果奖时，高等教育学人又好像找到了用武之地。高等教育研究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失语”与“火热”的实践形成了反差。再如，高等教育学对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难以发挥指导作用。以高校四年一轮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例，虽然高等教育学人早就提出了“淡化专业、强化课程”的改革思路，但难以在实践层面落实。以至于直到今天，历史形成的课程结构和知识体系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现象表明，

高等教育学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左右高等教育的微观实践，提出的理论或政策建议时常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更遑论引领高等教育实践了。

高等教育学对未来实践的引领性不强。高等教育学的任务之三是能够对未来走势进行前瞻性判断。一个时代的理论不仅要解决所处时代的问题，还要对社会的变化未雨绸缪。例如，高等教育实践正在受到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影响和冲击，但高等教育学对这些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前景和挑战还无法应对，也无法利用新技术对教师进行适应性培训，更未能利用这些新技术对教学和学习进行革新。高等教育学在预判技术创新对教育系统的长远影响上的敏感性远远不够，没有提出任何新理论来预见高等教育形态的变化以及人才培养规格的转型。当然，将高等教育学无法准确预测高等教育的未来视为不成熟的表现，是一个过于苛刻的要求。因为即使在国际范围内，对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可预测性都处在“观望”之中，也都无法给出及时回应。人工智能究竟会以何种方式重塑高等教育活动的“教”与“学”，仍需拭目以待。很明显，高等教育实践和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外部力量的影响，高等教育学滞后于时代发展，以及无法预测高等教育的未来，都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高等教育学发展到今天，其贡献有目共睹，其不成熟也四处可见。需要指出的是，探讨高等教育学的“成熟”只有在中国语境下才有意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人们喜欢用中国的研究范式和主题与西方相比，似乎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已经达到了成熟。其实，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也未必是成熟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在 20 世纪也曾被称之为“不结果的树”。我们今天运用的主要是西方早期的经典理论，是经过西方实践验证和时间筛选后的理论，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与西方国家有明显的“时间差”，对西方国



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与理论的修正过程知之甚少，往往是以理想的心态、“终极的理论”指导发展中的中国实践，这是不成熟的主要体现。

## 二、高等教育学“不成熟”的原因分析

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成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和文化的的原因，也有学科自身发展的原因，还有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原因。具体而言，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之后，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开始多元，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待越来越高，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随之丰富，其研究话题开始发生变化。这种现象不是我国独有的表现，而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具体而言，造成我国高等教育学“不成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高等教育学产生初期的“先天不足”

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与早期的学科知识积累不足相关。回眸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早期知识积累，人们津津乐道的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陈嘉庚等先人的思想，还不能称之为高等教育学的范畴，只能说是办学者的个人体验。这些个人体验或是借鉴西方高等教育思想，或是基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实践形成的原始、朴素的教育理念，而不是建立在系统的原始知识积累之上生发出来的对高等教育规律或本质的认识，这是“先天不足”的理论缺陷。由于没有足够的高等教育知识积累，高等教育学在建立之初，只能是通过移植苏联的普通教育学体系，通过“借鸡生蛋”模式建构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学。因此，脱胎于普通教育学范式的高等教育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缺陷，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与普通教育学的一般性就没有得到有效阐释。这一“先天不足”已然

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发展至今而未有明显改善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普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无法涵盖丰富的且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实践，无法满足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加的多样诉求，无法应对教育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猛烈冲击。由于高等教育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当我们仍用旧的研究范式来解释新的实践时，就会表现出高等教育学的幼稚性。

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与短暂的学科历史相关。从时间上看，高等教育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相较于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学科，其短暂的历史也意味着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发展方面，还没有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来形成一个完善的学科体系。从实践上看，中国近代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与西方不同，没有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从西方移植来的高等教育实践于中国历史情境而言，是碎片的和断裂的，所以基于断代的高等教育实践生发出的中国高等教育学还是一个初级理论。从理论上讲，任何学科的成熟都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来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历史时间较短，这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还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尤其是对国外高等教育实践和理论的把握不够精准，导致了实践中的一系列误读、误解和误用，如学分制至今无法真正实现，绩点制在评价学生时无所不包。

## （二）高等教育学后天发展的“营养不良”

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与自主实践缺乏相关。由于我国近代大学“自主办学”的历史短暂，以及近代大学早期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始终没有完成高等教育思想的本土化启蒙，使得我们对高等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十分浅薄或缺乏，只能借鉴他国的模式和理论，这极大地限制了对高等教育活动的理解。即便我们曾经“自豪”地认为我国大学的发展水平有过与西方大学比肩的历史，但严格说来，彼时的高等教育实践和理念完全是“跟跑”的状态，彼时的大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式”大学。这一现象对于后

发国家来说十分普遍，也就导致了无法进行本土化的高等教育理论构建。实际上，我国高等教育学今天面临的“学科危机”，其实是“自主实践”的危机，是自主实践的缺失导致中国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高等教育学自主实践的缺失或偏差，从表现上看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实际上是西方理论与本土文化难以兼容的“价值”问题，也可以说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与理论体系建构不足相关。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脱胎于普通教育学，尤其是苏联的教育学，加之在早期没有自己的知识积累，过分依赖于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没有形成一套独立的、专门针对高等教育现象的理论体系。仅仅将普通教育学的概念和理论“机械移植”至高等教育学中，不加区分地冠之“高等教育”的帽子。具体到我们熟悉的高等教育理论，除了“教育内外部关系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自主知识”的理论，甚至独有的概念也是凤毛麟角。这种对普通教育学的依附性限制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成熟，时常被看作其他学科的一个分支或附属领域，而非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立学科，集中表现为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来解释高等教育现象，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实践，而忽视了探索我国高等教育自身特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实践证明，建立在精英化基础上的高等教育理论无法解释大众化的实践，西方的普适性理论无法指导中国的特殊性实践，高等教育历史悠久的理论很难匹配历史缺失的实践，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无法解释人工智能的实践。由于理论的缺失，高等教育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经过验证的、保守的研究方法，而非尝试新的或更适应当前问题的方法，从而限制了对高等教育学的全面理解和深入分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高等教育学被视为“解释体系”，而非理论体系。

### （三）高等教育学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与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相关。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借鉴国外理论形成的,许多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在我国备受追捧。虽然在近代之初,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高等教育的“中国化”问题,但这个过程始终没有完成,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路径依赖。首先,制度上的路径依赖。我国高等教育实践自近代第一所大学创建以来,一直走的是模仿、移植、借鉴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模仿和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包括教育制度、专业设置、教学模式等。虽然苏联模式在我国只实行了17年,但形成的烙印却根深蒂固。改革开放后,开始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当下的导师制、书院制、学分制、绩点制、本科生院等无一例外都是学习美国模式的产物。当我们今天一再强调走出苏联模式之时,实际上我们既没有走出来,也没有学到美国的秘笈。其次,话语上的路径依赖。我国的高等教育学长期处于西方话语体系之中,上至概念和理论,下至隐喻和研究视角,从“象牙塔”到“动力站”,从布鲁贝克的“两种哲学观”到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再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理论等,已经形成了一种“话语”的使用惯性,即寻找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高等教育现象,仿佛加上西方话语的“装点”,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便迎刃而解。即使对我国独有的高等教育实践进行理论阐释时,也喜欢到西方理论中找答案。最后,理论上的路径依赖。高等教育学人熟悉的“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以及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学术、质量文化、“非升即走”等,西方每次出现一个新的理论,都可以在我国找到市场。对这些理论的严重依赖,导致我国的高等教育学有了理论惰性,缺乏理论创新的自觉。殊不知,高等教育的西方经验和理论是基于西方高等教育实践,这些理论对于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小毛病”在短期内也许有效,如果将这些成果不加筛选地“移植”,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和分化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的自主性。



#### （四）高等教育学发展环境的“外部压力”

不仅高等教育实践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高等教育学的构建也是如此。以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为例，对于这一外部关系的传统认识是从高等教育的内部活动逻辑出发，从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文化等关系范畴的平面思维来认识高等教育内在规律。但在今天，这种平面的视角已经无法揭示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中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关系。以本科生毕业率为例，高等教育学人很早就意识到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推进，在毕业率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宽进严出”。然而在实践中，不仅“宽进严出”无法实施，且质量底线还有往后退的嫌疑。显然，单从高等教育内在逻辑出发，无疑会难以解释这一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反常现象”。如果跳出高等教育来认识这个现象，无疑会发现高等教育不仅有学术属性，更具有民生的公共属性、社会的公平属性，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大国实践所出现的特有难题。因此，看待高等教育活动不能从一维的高等教育内部逻辑来探讨，需要从更广阔的战略方位来探讨高等教育与社会诸种关系之间的平衡。特别是今天的高等教育肩负着教育强国的龙头责任，对于高等教育属性的研究与认识就不能从经典逻辑出发，而需要跳出高等教育、立足长远和着眼大局来看待和研究高等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科技属性、民生属性。这些研究视角的转变是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理论范式所未曾有的，也是中国特有大国高等教育实践决定的，这些既给高等教育学人提出了难题，也带来了挑战。

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与学科评价相关。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并非都是学科自身造成的，也与学科的外部生态有极大关系。从一门成熟学科的发展看，往往需要数代人的理论知识积累和原始知识创新，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研究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与势偕行的知识生产、传播与创新的机制。无疑，高等教育学学科成长的早期或幼年时期，学科建制不仅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取得合法地

位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规范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提升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水平，追赶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理论提供了强大保障。但在学科发展从知识原始积累走向知识创新发展阶段时，已有的学科规制也有可能规范学科知识生产创新的同时走向学科发展的反面。以学科评价为例，学科评价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强的“指挥棒”作用，评什么、如何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发展的重点，其价值导向正在致使学科发展的异化，许多量化指标为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埋下了削足适履的隐患。受限于量化考核的压力，学科发展中过度追求短期内可见的成果，如论文发表数量和课题立项数目等，而偏离学科培养人才的长远发展目标。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学科评价，导致高等教育学难以为实践提供真正的解释、指导和引领价值。这些现象说明，今天的学科评价尽管还在促进学科发展，但这种促进是用过往思维和尺度来评价未来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这种“刻舟求剑”式的惯性思维，虽然可以起到短期效果，但从长远发展看，不利于学科知识的原始创新。

### 三、什么是成熟的高等教育学

要想获得一个大家都认同的高等教育学成熟标准比较难，但时代的发展确实已经为成熟的高等教育学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要求。

#### **（一）成熟的高等教育学既要紧贴时代发展又要启蒙高等教育现实**

世界大学有近千年的历史，如果从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一书算起，高等教育研究不足200年的历史。回头来看，纽曼等西方学者对大学理念的解读，与其说是对现实高等教育的批判，毋宁说是对高等教育实践的重新启蒙。实际上，高等教育思想的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高等教育学的价值。这种启蒙意义就在于现

有的高等教育实践超出了已往的认知，往往造成新的高等教育实践与旧的高等教育认知的落差，这一落差促使高等教育思想要么以旧的理论解释新的实践，要么催生新的高等教育理论。这一过程是重新认识高等教育规律和本质的过程，是重新理解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过程，是重新启蒙高等教育现实的过程。无疑，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时代背景、新的技术呈现、新的发展方位，高等教育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变革得更快。高等教育学要想跟上时代步伐，必须有一个对高等教育实践重新认识的过程。反思我国第一代高等教育学人对大学的解读，主要是基于经验总结以及原则规律的探索。然而，今天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考的话题。例如，大学职能与功能问题、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问题、大学专业和课程设置问题、学科与评价问题、大学教学过程以及师生关系问题。特别是技术手段的发展，高等教育呈现了许多传统理论无法阐述的新形态和新趋势。可以说，高等教育的所有活动都要重新认识。只有重新认识高等教育现实，才能更好地解释高等教育现象，更有效地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更高层次地引领高等教育未来。从这一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学并不是为构建“学科”而生，而是为高等教育实践而生，为高等教育实践出现的“真问题”而生。

## **（二）成熟的高等教育学既要观照利益相关者又要超越利益相关者**

高等教育作为一项独有的社会活动，其核心就在于传承和创新人类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因此，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其核心就在于能够观照社会不同群体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并引导不同群体的需求。从利益相关者需求的视角审视高等教育学的成熟，就会发现高等教育学研究需要观照不同群体利益又要超越现实利益。首先，国家作为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者和决策者，他们关注的是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因此，高等教育学人应该提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的研究成果，

如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预测、政策效果评估、战略规划制定等，以支持国家和政府作出科学的决策。其次，地方政府和个人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和投资者，他们关注的是高等教育的社会效应、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因此，高等教育学人应该关注社会热点和现实问题，开展与社会需求紧密相关的研究，如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研究、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等，以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和需求。再次，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实施者，他们关注的是教育教学改革、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因此，高等教育学人应深入研究教育教学改革的前沿问题，如课程体系的优化、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评价的改革等；同时，也要关注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的需要，提供学科发展趋势的分析、师资队伍建设的策略建议等。最后，教师和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他们关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学术研究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高等教育学人应关注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和关切，提供个性化的学术指导和职业发展建议。但基于利益相关者需求的视角探讨高等教育学应注意一点，因为不同利益和立场会使高等教育学立论的根基不同，形成不同的高等教育理论流派。例如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与认识论之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社会需求论与个体需求论之争，“宽进严出”与“宽进宽出”之争，表面上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而实际上则是反映了高等教育认识的立场不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成熟的高等教育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需求的被动反应上，更需要超越现实的需求，着眼于更远的未来，协调、平衡和包容不同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 **（三）成熟的高等教育学既要解释高等教育实践又要引领高等教育实践**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关于认识与实践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总结。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研究的价值核心，应该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有力的解释。例如，通过对教育制度、教育过程、教育质量等方面的研究，揭示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机制。通过对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深入解析，为理解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提供重要依据，进而指导高等教育的实践和发展。因此，为增强高等教育研究对现象与问题的解释力，高等教育学既需要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更需要在高等教育实践中不断求证理论的正确性，并推动理论创新，从而更准确地解释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当然，增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解释力，不等于一味地迎合高等教育实践。相反，高等教育理论解释力不仅在于诠释实践活动的合理性，更在于深刻把握高等教育活动规律的基础上，揭示高等教育实践活动存在的不足、可能偏离的方向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换言之，其解释力不只是完成“存在即是合理”的论证，而是需要在应然状态下回答高等教育如何才是合理的。为增强高等教育研究对现实实践的指导，高等教育学重点需要关注实践合理需求，深入高校和教育实践现场，了解教育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这些实际问题进一步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规律、原则与方法，从而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提供前瞻性、预见性的引领。例如，人工智能正在冲击着高等教育，同时也为解构和重构高等教育学埋下了伏笔。对于当今的高等教育实践，传统高等教育学已无法解释因技术变革带来的高等教育革命性变化。而如何深入了解高等教育因技术变革带来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的变化，显然既不是哲学家式的冥思苦想，也不是空想家式的天马行空，而是需要高等教育学人紧跟技术发展，总结高等教育新形态、新特点，从而更好地预见未来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过去，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在技术上存在着发展的鸿沟，技术实践基础的缺乏，使高等教育理论出现了所谓的“空中楼阁”。在今天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进程中，中国完全有可能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将来出现领跑，技术进步最需要也最有可能催生新的高等

教育理论时，就需要高等教育学人始终保持关注技术与高等教育融合的敏感性，否则，即便我们和西方处在同样的时代起点，高等教育学还是会滞后于时代进步，无法摆脱“跟跑”的状态。

#### （四）成熟的高等教育学既要扎根中国又要与西方平等对话

同过去相比，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相比，中国高等教育实践呈现出高等教育大国的独有难题和特点，这些既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特殊研究对象，也是重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活水之源。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成熟，需要立足中国特殊的国情实践，从中国高等教育大国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有的语境中来重视审视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的战略方位。不可否认，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成长的初期，很多高等教育理论是从西方工业化时代的高等教育理论中借鉴而来的，但在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处于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不仅要继承传统工业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一般理论，更要关注工业化与信息化叠加发展的特殊发展特点，并从这一特殊性出发，进一步揭示未来信息化社会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客观规律。还应特别注意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发展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硬性移植与嫁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为断裂，高等教育学科建构更多时候是以西方思维来解构和批判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不足，这种对传统文化“破”多“立”少的特点，使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缺乏传统深厚历史文化的滋养。事实上，在早期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理论之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呈现出激烈的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但从时代发展背景看，处在急需改变现状并图强变革的历史特殊时期，总体趋势是“西方”压倒“东方”。无疑，历史无法更改，但历史给未来提供镜鉴。由于上述历史发展，尽管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成长是“土生土长”的，但归根结底，其理论的种子是来自西方。尽管在其适应中国环境的成长过程中，呈现出中国的特征，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带有一定的西方依附性。

在今天，当我国高等教育从一穷二白到走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型时期，如何正确地看待“西方”与“东方”，如何提升高等教育人才自主培养能力，高等教育学人有责任把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先进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进行对话、融合与创新。这一过程首先扎根中国高等教育实际，把握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其次，提炼中国经验。中国高等教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经验。我们应该对这些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和模式，这些经验和理论将成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增强研究自主性。大力推动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研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领域，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注入新的活力。最后，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不乏中国特色，如素质教育、立德树人等，既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自主实践，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独有的话语，但這些概念、理论和实践成果并没有被国际高教界所知晓，使这些成果的“文化普遍意义”大受局限。因此，强调高等教育扎根中国实际，并不意味着排斥国际交流与合作。相反，高等教育研究需要站在更加宽广的视野加强国际合作，学习国际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 and 实践经验，特别是研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研究的先进方法与手段，以国际接轨的学术语言讲好高等教育实践的中国故事，通过“中国化”的研究，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 四、结语

任何学科的成熟都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既要正视和承认高等教育学的种种不成熟，也要理解其不成熟，不应该苛求高等

教育学的不成熟。正视其不成熟，恰恰是走向成熟的开始。之所以不应该苛求高等教育学，是因为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超出所有的历史现象，如 AI、ChatGPT 等。这些“新要素”究竟会引起高等教育哪些变化，目前还是“见仁见智”的阶段，故不能因为这些新要素来判定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总之，产生于工业时代的高等教育学与当今智能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实践场景完全不一样，面对全新的高等教育实践和高等教育学呈现的“捉襟见肘”，不能成为苛责它“幼稚”的理由。不能用现在的高等教育实践来否定过去的高等教育学，不能用现在的变化否定过去的实践，也不能用现在萌芽中的实践来否定过去的理论，更不能用过去的理论来否定现在萌芽中的实践。在高等教育的追赶时期，人们不得不用已有的、现成的、西方的高等教育学来解释中国实践。但今天信息技术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挑战，我们与世界同处于一个起点，理应有足够的学科自信来应对挑战。

高等教育学发展到今天，其学科属性和成熟的特征愈发明显，它是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是一个高度跨学科领域，它是一个受本土文化制约的学科，它是一个受技术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的学科。因此，我们对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应给予足够的时间和支持。高等教育学从产生以来就是中国话题，我们所谈及高等教育学的成熟，就是要解释、指导和引领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高等教育学人的使命和责任应是扑向中国实践、深入中国实践，构建真正的中国高等教育学。







## 周洪宇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副组长，长期致力于研究陶行知学、教育史学、教育政策学、教育实践四个领域。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多项重点课题，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教育

学刊》《中国高等教育》《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美国）等中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出版专著 30 余部，研究成果 20 余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周洪宇积极履行社会职责，提交议案建议 400 余件，被采纳 70%。其中，提出的实施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教科书免费制度、建立国家贫困生资助体系、完善高等教育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制定《国家统一法》（《反分裂国家法》）和修订《立法法》等政策建议和议案，通过全国人大，促成了有关政策立法出台。

2008 年 12 月，被中国教育电视台等评为“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2009 年 1 月，被中国教育宣传网等评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基础教育影响力人物 30 人”。2012 年被《检察日报》评为“十位有影响力的人大代表”（第一位）。2016 年，在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2017—2018）评选中位于“社会智库专家 MRPA 测评综合分排序”第二。2017 年被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六个全国性教育社团推选为“当代教育名家”（90 人）。

在周洪宇院长的带领下，长江教育研究院涌现出了一批智库专家，如雷万鹏、申国昌、张建林、张炜、黄艳、付卫东、刘大伟、刘来兵、付睿等，其中有 6 位进入“社会智库专家 MPRA 测评综合分排序”前 20 强。

# 陶行知：世界教育大师

来源 | 《陶行知学刊》2024 年 01 期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世界教育大师。为什么说先生是世界教育大师？先回答什么是教育家，什么是一流的教育家这两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教育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一流的教育家，甚至作为世界教育大师，他必须至少符合五个方面的标准。

第一，教育家必须只有远大的教育理想和信仰，没有只备远大的教育理想和信仰的教育工作者谈不上是教育家。

第二，教育家必须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而且这个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必须一直是第一线的。

第三，教育家必须只有原创性的教育理论或者学说。原创性的教育理论和学说里面有哪些因素？首先要基于一个核心的哲学范畴，是从哪个角度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进而产生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或者更高层面的体系，更完整的学术体系。

第四，教育家必须在教育实践工作中培养大量的优秀人才，而且这些人才一定是各方面的人才。不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探索，培养的人才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公认。

第五，教育家必须要有人格魅力、人格力量、人格精神，要能够影响到教育、社会乃至人类。

从这五点来说，先生就是一位一流的教育家。他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各类教育实践，包含七大教育运动，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办了四大教育机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

时至今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只有很强大的价值和作用，他的战略思维、全局观念责任意识，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教育发展。

先生提出的理论，可以概括为“生活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我在协助我的硕士生导师董宝良老师编《陶行知教育学说》的时候曾建议，先生的教育思想不能和一般的教育家混同、等同，他比一般的教育家站得更高、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的理论体系和构架相当完整。先生在大量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他的教育思想——生活教育学说，包括三大哲学原理和若干个重要的教育主张，具体说，三人教育哲学原理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在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先生的生活教育和杜威的生活教育在很多地方是相关和相同的。作为杜威的学生，先生在晚年也讲到，他的生活教育的米源有几个方面，其中一点就是他的老师杜威的生活教育学说。他也讲到了他还受益于当时教育界的一个老前辈——张謇。先生讲张容的教育思想，就是深入到学校、基层、农村，注重生活，一切从生活中来。而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基本概念范畴这些方面深刻地影响了陶行知。杜威是这样讲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先生把它从字面上颠倒了过来，你说教育即生活，我就说生活即教育，你说学校即社会，我就说社会即学校，你说做中学，我说教学做合一。

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科科长朗格朗提出终身教育的思想，其实在他提出的2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已在《全民教育》这篇英文著作里明确提出终身教育这一概念。换句话说，陶行知是今天终身教育的先驱，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教育思想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陶行知先生通过自己的实践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影响了世界教育。当下，我们正处于世界大变局的新时代，我们理应深入地挖掘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当代意义，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培育教育家精神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来源 | 《中国教育学刊》2024年01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迫切需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底色。要“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需从四方面努力，即“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全党全国人民要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共同努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教育强国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让教育强国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明确指出了：“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本质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的根



本保证、根本任务、根本目标、重要使命、基本路径、核心功能和价值追求，即“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现代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化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强调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求“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既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探索未知的兴趣”“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空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

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基础，教育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支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统筹职业教育关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教融汇，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本质是全体人民人力资本的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持续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私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时时可学，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处能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教

育强国，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落实这些要求，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全面贯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陆亭

## 教育是“硬”的软实力

来源 | 《北京教育(高教)》2024年06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马陆亭

高等教育学是我国独有的学科，经过第一代高等教育学人的努力，高等教育学获得了“合法性”的学科身份，走过了一段学科的“辉煌”，形成了国际上独有的学科建制和庞大的研究队伍以及相对丰富的资源配置。虽然高等教育学在我国经历了“学科”“研究领域”“院校研究”的多年之辩，但学人已普遍认识到这些讨论既没有生发出具有明显区别的独有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实际的贡献。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价值不断彰显，在我国被视为整个教育体系的“龙头”。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也给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压力。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亟需高等教育学给予回答。高等教育学能否承担起这一使命，不得不引起高等教育学人的思考。

## 一、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吗？

高等教育学在我国已有 40 年的学科史，在当下如果说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恐怕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它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社会需求。如果说它是一个“无用”的学科，显然遮蔽了它 40 年的存在价值，既不符合它在国内作为学科作出的贡献，也不符合它在国外作为研究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说它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似乎可以让人接受，因为高等教育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面临着类似的发展困境。但也可以看到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社会各利益主体对高等教育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期许，也有实践上的需求。实际上，高等教育学走到今天依然是一个“正在发展、有待提升和有待成熟的学科”。

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得益于我国独有的学科建设制度。在我国，学科地位对于任何学科的生存与发展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学科地位，既难以在体制内获得认可，也难以从体制外获得资源，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就无从谈起。正是在学科建制的“庇护”下，高等教育学才能迅速成为“土生土长”的学科，才有了相对稳定的学科地位，才有了学科的影响力。高等教育学的产生和演进过程，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是罕见的，在世界上是独特的，其作用和贡献是可以感知的。

高等教育学发展到今天，基本具备了学科建制和规训所包含的一切要素，包括人才培养单位、学术研究组织、专业出版物和学位授予点等一应俱全。在许多高校既有独立建制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有依附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机构，还有与学校规划等职能部门融为一体的研究机构。诚然，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形式和架构的不同，使得学科在学校的地位完全不同。尤其在我国的学科评估从二级学科转向一级学科的过程中，一些院校的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依附于公共管理或管理科学等学科时，其“存在感”普遍偏低，几乎难以获得很好的发展空间。高等教育学在一所高校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水平，与其学科是否独立设置直接相关，只有获得相对的独立建制，才能成为稳定的学科。

高等教育学发展到今天，其理论张力得到了释放，学科的外溢效应日益彰显。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已渗透在国家宏观政策制定和高校内部治理的方方面面，



它不仅为各级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还对高校的内部治理提供了改革思路和建议。实际上，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最初都产生于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尔后从高校内部走向高校外部，最后再回归到高校内部治理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类型还是研究范式和方法以及研究领域和主题，都在发生变化。例如，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上，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和转向“院校研究”的机构不断增加；在研究范式上，从关注思辨和引进西方理论到关注中国问题；在研究领域上，从关注宏观开始转向宏观





申国昌

## 陶行知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思想与实践研究

来源 | 《教学与管理》2024 年 15 期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江教育研究院秘书长 申国昌

20 世纪初，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国传统教育逐渐向现代教育过渡，但因沉痾已久，读书做官、死读书等封建传统教育思想依然支配着学校教育。陶行知针砭时弊地指出：“‘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教育严重脱离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学校与社会脱节现象严重，而传入的西方新教育运动却缺乏对乡村和下层民众的关注。陶行知为了改变教育现状，开始办学实践，从中国具体国情实际出发，针对传统旧教育和洋化教育的弊端，特别强调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通过教育培养普通民众做自己和国家的主人。这样文化才能向大众解放，教育才能向大众下移。陶行知糅合古今中西教育思想精华并总结自己教育改革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独具中国特色

的教育理论体系，其中关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思想的源流与轮廓主要受中国传统儒墨学说及西方卢梭、杜威等人思想的影响，尤以杜威关于学校和社会、教育和生活以及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更为深刻直接，具体主张更是在前述思想基础上继承、改造与发展，颇有独特性、创新性和前瞻性。故此，本研究在探讨陶行知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思想的理论基础上，剖析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之间内在逻辑关联，阐释推进一体化育人的实施路径并总结其价值意蕴，以期相关工作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 一、循环互促：陶行知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

只有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学生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和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三者协同育人一体化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推进保证。家庭是基石，学校是中枢，社会为一体化协同育人提供保障，通过深入剖析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内在逻辑关系，明确各自功能定位，探求其耦合性，才能真正理解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真谛。

### 1. 家庭是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基石

首先，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教育对人的发展起着奠基作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皆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之上，家庭教育是家校社形成合力的基础。陶行知认为，家庭教育起着陶染和引导作用。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和习惯志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孩子的成长道路离不开父母的教导与指引，即使接受学校教育或步入社会，家庭教育依然重要。

其次，家庭教育要培养儿童独立人格，为社会化做准备。受欧风美雨的影响，陶行知不仅非常注重培养子女独立自主的人格，认为这是今后步入社会的基石。子女要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从“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到“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循序渐进地自立立人、自助助人、自达达人。而且要求家长尊重子女人格尊严，父母的教养方式要宽严相济，逐渐

打破传统家长专制的家庭教育模式。他还注重引导孩子社会化，如建议儿子陶晓光要“从家庭的小世界里把自己拔出来，投入大的社会里去”，如此才会觉得生活更有意义。并且提倡家长带孩子进行择业参观，选择最合孩子心意的职业，为未来走向社会作铺垫。

最后，家庭的场所是生活的场所，也是课堂，充满了教育意蕴。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生活与教育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所以家庭生活也具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从场所来看，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是课堂，陶行知认为出生便是破蒙，他创造出连环教学法，“用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全家一齐读书明理。通过家庭成员间双向互动、相互教育的活动，将大众平民教育推广开来。

## 2. 学校是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中枢纽带

一是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学校教育是家校社三位一体相互联结的纽带，是信息反馈的重要通道，也是处理各方复杂矛盾的交叉点，更是三者有效发挥整体效应的关键。陶行知认为学校教育作用巨大，“学校的势力不小，他能教坏的变好，也能教好的变坏”。希望学校不断优化自身发展，管理透明。“做校长的做教育的都要欢迎人参观批评以补自己之不足。学校放在太阳光里必能生长，必能继续不断的生长。”因此，办好的学校，就要经得起家庭、社会各方面的考验和监督，充分发挥社会文化教育中心的作用。

二是提倡学校教育社会化。陶行知强调学校教育要面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服务，要敞开大门办学，并主张将整个社会变成学校，把大众的生活场所当成教育的场所。学校除了要教学生读书，更要教学生做事，要和社会相联系。陶行知认为要拆除学校同社会间的藩篱和围墙，将学生从樊笼中解放出来，将学校从“鸟笼”中解放，与乡村、城市、家庭、社会、国家、宇宙相联系。学校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城门、国门，办“真正的学校”，将社会的广阔天地当作学校的课堂，带领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广泛依靠和运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来办教育，促进教育社会化，改变传统办学主体，由群众办自己需要的学校。

三是强调学校以生活为中心。陶行知主张学校各种事务都要含有教育的意义，只有以“学生全人全校全天的生活为中心的”才算是活学校。要办“活学校”而非“死学校”，如此才有价值。学校还要含有社会的意味，了解社会的需求。作为社会化的第一步，学校要与社会生活实际密切联系，“学校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起点”，学校要为社会改造和发展服务，不变成孤岛。学校在确定培养目标时需要考虑社会的需求与家庭的愿望，不与社会脱节，要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如此才能办成真的教育、好的教育。

### 3. 社会为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提供保障

一方面，社会为学校提供发展条件和价值基础。教育和社会的发展互为条件和手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在陶行知看来，教育能够解放人类，改造社会，把握国家命运。而社会拥有各种教育资源和实践基地，为家庭和学校教育提供条件，促进教育发展。陶行知非常注重社会的教育价值，他认为社会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来影响人，通过丰富多样的教育内容、灵活高效的教学手段和广泛的途径渠道充分弥补了学校和家庭教育中的不足，有助于实现终身教育，促进了教育贯穿于人生。陶行知还曾发起“社会大学运动”，为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大教育体系作出新的探索。他认为大学有有形和无形之分，无形的社会大学应被承认和重视，因为无形大学是整个社会生活实践，是最自由、最伟大、最符合民众需要的。社会大学之道，是要为人民造幸福，一切的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

另一方面，社会是一所无形的学校。陶行知强调“社会即学校”，要拆去学校与社会中间的围墙，“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运用社会的力量，扩大教育的环境资源，丰富教育的方式方法，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为了尽快普及教育，使人民大众都能有机会接受教育，陶行知提出要“把整个的社会或整个的乡村当作学校”，使学校教育在空间上得到极大扩展。“社会是大众惟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惟一的教育”，整个社会是学校，学校仅仅是一个课堂，强调教育场所的开放性。陶行知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办学形式，主张积极在社会上举办各种便于普通人民大众及其子女



学习的场所，如民众茶园、自然学园、通讯学校、业余学校、社会大学等，体现了“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促进了社会教育化，把社会办成一所全民的大学校，充分挖掘社会文化每个细胞的教育要素，成为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共同承担教育重任。

从“空间”关系来看，家庭、学校和社会同处于教育事业“多维立体空间”的不同极点，构成了比较典型的空间立体协调关系；从“作用”关系来看，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各有侧重，但彼此相互促进和互为支撑，存在明显的“循环互促”逻辑关系。而且“每一个主体对另外两个主体的发展都同步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因此，三者融合成为一体联动和一体推进的综合体，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三角协调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协同关系，三者良性互动且一体衔接，是更好推进三者实践的逻辑根由。

## 二、多维助推：陶行知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实施路径

“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全社会都要关心和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形成社会、学校同家庭密切结合，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局面。”陶行知将学校与家庭、社会构成一个整体，创造了四通八达的教育网络，把家庭、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使三者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创造性地对家庭、学校和社会进行“三位一体”的统筹部署，彰显了家校社三者之间的有机辩证联系，主张协同配合、系统集成，这是对生活教育理论内涵的丰富和拓展。具体实施路径有如下几个方面。

### 1. 坚持整体教育观

陶行知构建了包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整体教育体系，建立了“大教育”的宏大格局。他认为“我们的教育不限于学校的形式。既然真正的教育来源于人们生活间的接触，任何有人居住或聚集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一所大众学校。于是，我们的学校是在庭院、走廊、街道、商店、乡村的寺庙及兵营中举办的。整个社会是我们的学校，全部生活是我们的课程”。整个的社会活动，都是教育的范围，社会真正成为一所学校。陶行知坚持整体的大教育观，将教育



深深根植于整个人类生活之中，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教育等同于学校的“小教育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贯穿为一个整体，强调系统化整体推进，如此才是“活”的教育。这种教育观促使教育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使得家庭、学校、社会紧密结合，让教育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

## 2. 推行工学团组织

工学团集生产、教育、自卫等功能于一体，是满足群众需要的全新的教学组织形式，更是陶行知理想的社会基层单位，“在这里面是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这些新型“文化细胞”构成一个巨大的、辐射范围广泛的社会文化网络，从而构成一个大社会、大学校，并发挥着重要作用。陶行知设想将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校、军队、乡村、农场等都变成工学团，通过“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等基本主张改造旧教育和探求新教育出路，从根本上改造学校教育，为普及教育提供崭新路径，实现了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育人功效，更体现其民族救亡的强烈愿望。

## 3. 倡导“小先生制”

为了更好普及教育、推行生活教育，陶行知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在开展工学团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小先生制”，这是他独创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式和形式。“小先生”的职务是教人去教人，把从大人或其他孩子那里所学知识教给其他人，其他人再去教不识字的人。小学生变成小先生，用小孩的力量，来普及生活教育，每个小先生犹如桥梁纽带，连通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一张巨大的生活教育网，向各个角落传递科学文化知识力量。推行小先生制不仅有利于尽快普及教育，使知识公有，实现“教育为公”“文化为公”的远大抱负，还可以促进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实现流通，使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建立紧密的联系。小先生制深入社会各层级，通过即知即传、开门教人等方法，不仅教人，更注重教人去教人，将知识和技能从学校传递到家庭和社会，改变了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为普及教育提供了新思路、新原则和新方法，也将家庭、学校和社会有机联系在一起，充分揭示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底色。

### 三、余音绕梁：陶行知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价值意蕴

陶行知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打通，注重三者的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回归育人理念目标，主体指涉迈向多元，实施策略趋于完善。

#### 1. 深化中国普及教育的变革

陶行知“把学校的范畴扩大到社会，以汲取更多的教学素材，使用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和工具，开发更宽广的教育环境，邀请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参与教育”，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思考教育问题。在教育思想层面，这是近代以来对以学校教育为正统观念的冲击与突破，丰富了教育内涵，扩大了教育的对象，深化了对教育的认识，拓宽了教育的范围，增强了教育的效果，带动了学校课程、教学、管理等全方位的变革，将整个社会当作学校，从本质上“提出了社会（形式化的人）与学校（形式化的教育）的关系”，促进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进程，根本改变了教育观和学校观，使得学校与普通大众、与家庭、与社会真正联结；在教育制度层面，突破了传统观念对教育制度的认识，为后期国民教育制度法颁布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在教育实践与事业层面，深化了对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实践活动的认识，有效地整合了“包罗万象”的社会教育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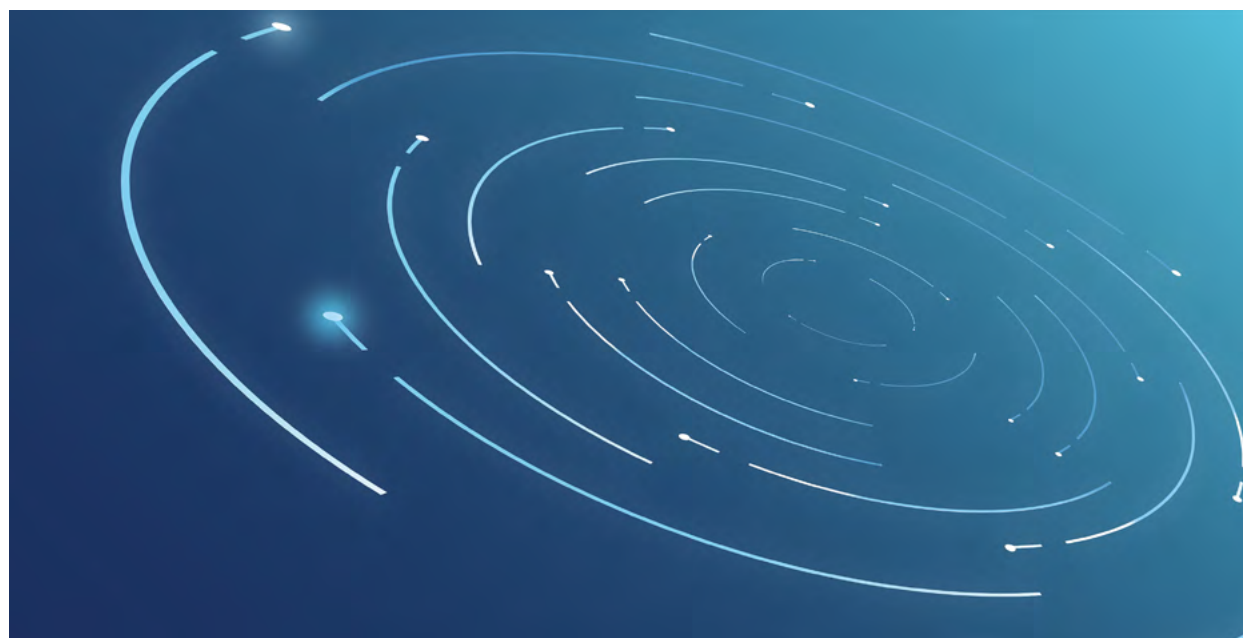
#### 2. 推动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陶行知的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思想与实践以生活教育为核心理论基础，以平民大众教育为推手，与基层民众生活需求相结合，“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文化视野下移和扎根基层的教育实践创新”。陶行知极力主张要重视乡村教育，强调要改造传统的乡村学校，以教育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进而改造乡村社会。于是发起了乡村教育运动，“创造了乡村学校网，将成百个家庭联系起来。这些学校不仅为儿童提供基本的教育，而且也为成人提供识字教育”。陶行知坚持治愚与治穷相结合的“全民教育”理论，坚持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教育共同体，有助于扫除文盲，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深化乡村教育改革，为教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 3. 促进教育实质性发展与良性循环

陶行知在坚持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原则的基础上，打通家庭、学校和社会彼此间的隔断，构成了相互协调的复合型组织系统，从而形成三位一体协同育人合力，发挥整体效应，使文化充分传达和发展，成为大众的文化、民众的文化。陶行知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多主体同在，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整合各方教育资源；家庭教育作为支撑地，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社会教育作为辅助地，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全面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在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上志同道合、达成共识，相互扶持、相互监督、相互评价，同质、同向、同步进行教育，促进教育实质性发展与良性循环。

作者简介：申国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鹏丽，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付卫东

## 新文科建设的宗旨、任务及前景

来源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04期



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付卫东

近年来，人工智能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人类社会正加速步入智能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大幅度提升运算速度和降低计算成本的同时，也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资源。以深度学习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情感计算、数据挖掘等方面和教育不断融合，人工智能正在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和《人工智能与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等文件，我国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开发标准》等文件，为未来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进行规划和指导。

## 一、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应用中面临的伦理性、包容性和公平性问题

2021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与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中提出，以合乎伦理、包容和公平的方式将人工智能用于教育领域，影响着每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该建议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2021年10月和11月先后发布《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开发标准》和《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框架》等文件，并明确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小学信息科技课程，但目前存在问题如下。

### 第一，伦理性问题。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应用中存在三方面伦理性问题。

首先，隐私问题。以人工智能领域最常见的生物识别为例，随着移动定位系统、监控摄像设备、智能可穿戴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些中小学将学生的指纹、人脸数据存在本地终端设备上，并采用物理加密的方式确保数据的完全脱敏和本地化储存，但也有一些生物识别数据保存不当，存在严重安全风险。不仅如此，有些中小学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教室摄像头监视学生的行为，这就超越了伦理底线，因为学校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来检查学生在课堂上的专心程度，学生以“赤裸裸”的状态被置于智能化空间之中，提升了学生焦虑程度。

其次，决策偏误问题。在预测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个人将会被有区别地对待，迫使个人处于被误判的状态。例如，科技公司收集大量中小学生学习交互数据，通常采用机器学习技术来定义“痛苦、无聊、迷茫、无所谓……”这些数据反映的情况和“边缘型心理健康”高度类似，最终这部分学生会被判定为“需要治疗的潜在患者”。

最后，算法歧视问题。人工智能依赖大数据，而大数据并非真正客观中立，往往会存在算法偏见。算法偏见是指在看似客观中立、没有恶意的程序设计中却带有开发者的偏见，或因数据存在倾向性，或因技术局限性，在实际应用中导致性别歧视、年龄歧视、阶层歧视和区域歧视等。例如，基于算法偏见可能导致弱



势群体学生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遭遇歧视，甚至被标识为“高风险群体”，并且这种算法高科技面貌和责任主体模糊往往使得算法决策陷入审查难和问责难的窘境。

**第二，包容性问题。**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虚拟网络生活，当前学生行为都处于大众视野之下。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疾驰车轮下，中小学生的心理变化、所思所想都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看透”，失去了包容性，学生将陷入无隐私、无意志自由、受到束缚的尴尬境地。另外，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技术是由过去受到良好教育的成员开发的，并往往在表现中等及以上的学生中进行实验，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部分学生群体中获得的实验结果和算法缺乏包容性，可能并不适应其他学生，或者效果较差。还有，人工智能技术采集的高粒度、高频度的数据为科学预测学生学业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但过分依赖人工智能技术的分析结果，缺乏包容性，忽视了学生的发展和创造力，会不自觉地限制和剥夺学生成长的权利和机会。

**第三，公平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先进性将一部分学生排斥在公平之外。例如，数字化基础设施不足，导致部分学生尤其是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学生缺少人工智能应用的基本条件，这种新数字鸿沟加大教育不公平。目前只有大中城市部分学生能够使用人工智能设备，如智能导学系统、智能学伴、智能机器人和作业自动批阅系统等，他们在学习和考试中的表现可能会更好，而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却无法享受，少数学生独占认知增强技术导致认知能力不平等造成更深的社会鸿沟，造成严重的阶层歧视和区域歧视，并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目前不少发达城市学校开始利用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刺激人体周围神经系统，激活脑神经的突触可塑性，从而增强中小学生学习大脑的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效果。然而这仅仅是少数学生的“专利”，这种技术带来的不公平比其他所谓更理性的手段带来的不公平更不为公众所接受，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

## 二、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应用中的伦理规范、包容性和公平性实践进路

人工智能给中小学教育带来严峻挑战，如伦理性问题、包容性问题和公平性

问题等。因此，要加强风险预防与约束引导，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在中小学应用中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一，注重人工智能伦理的意识形态及数据保护，确保人工智能在中小学应用中的伦理规范性。2020年、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和修改《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2021年9月我国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无不表明对人工智能伦理性问题的深度关切。

首先，注重人工智能伦理的意识形态性。人工智能伦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将人类伦理价值观与人工智能伦理价值观进行协同，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社会谋福祉。我们要防止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应用中的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碎片化人工智能伦理的认知搭建成清晰、系统的框架，时刻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指导中小学生学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工智能伦理观，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其次，制定数据保护的制度和法规。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都有严格的数据保护法规，可确保个人教育数据不在教育过程之外与第三方共享，除非满足某些隐私条件。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强学生的数据保护意识，对学生个人信息使用、发布持谨慎态度，避免过度收集，逾越红线，成为泄露他人隐私的推手。同时，既要防止学生的私人数据和公共数据被人篡改和非法买卖，又要进行必要的灾备存储以防止学生信息归零。

最后，目前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应用的数据大部分被大型科技公司所掌握，可能会造成伦理风险，建议探索制定数据收集和使用补偿机制、定期审查机制和第三方监管制度等，确保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应用中安全、可靠、可控发展。

第二，保证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中小学教育的普适性，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中提出，确保教学和学习中人工智能工具能够有效包容有学习障碍或残疾的学生，以及使用非母语学习的学生。因此，要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门槛，不能将处境不利学生排除在外，坚持弱势群体优先的原则，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重点向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

倾斜。尝试开发针对患有自闭症、书写困难或视觉障碍等学生的人工智能软件，帮助这些具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能享受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坚持公平至上的原则，在向中小學生推广使用人工智能 App 等软件的时候，注重性别平等，防止人工智能程序、数据集和算法加剧数字性别鸿沟和学习不平等现象。

第三，培育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确保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中顺利实施。《人工智能与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中提出，采取措施提高社会各领域人员的人工智能素养。人工智能素养与数字素养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人工智能素养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获取、加工、使用、评价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而具备的意识、能力和责任，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意识、人工智能知识与技能、人工智能应用和影响、人工智能伦理和社会责任等。

首先，制定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标准。2022 年欧盟已经推出 DigComp2.2 版本的“公民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里面融入人工智能相关内容，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在从人机交互、STEM 等不同的角度提出人工智能素养框架。我国顺应人工智能发展潮流，借鉴国外典型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加快制定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标准，其中包含人工智能的认识和理解、人工智能知识和技能掌握、人工智能应用与批判、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安全等。

其次，加强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培育。目前我国中小学已普遍开设人工智能课程，但当前人工智能素养已经超越相关课程范围，通过多方式、多手段“一体式”提升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已迫在眉睫。例如，采取高低衔接的方式，在信息科技等课程中定制人工智能素养提升项目；通过定期进阶培训的方式，提升中小学教师人工智能素养。

再次，开展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评价。基于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标准，研制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评价模型，充分考虑不同学段、不同地域师生数字素养发展水平的差异，开展分层分类精准评价，帮助发现师生人工智能素养薄弱环节，开展因材施教。

最后，关注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伦理和社会责任。在中小学师生中广泛开展

人工智能态度、伦理和价值观教育，通过开展相关专题讲座、知识竞赛、辩论赛和网上讲坛等，加大对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社会责任的宣传力度，增强法律知识和伦理规范。指导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如何安全上网，培育中小学师生在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责任感、道德判断力和甄别虚假信息的能力。



黄 艳

## 中国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源 | 《中国高校科技》2024 年 01 期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黄 艳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创新与协调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素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经济发展的逻辑要从总量非均衡扩张式增长转变为结构均衡协调发展的历史要求。高等学校肩负着实现科学研究发展、促进知识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的重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和知识经济时代提高社会生产力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高校主要通过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新发展理念的战略背景下论证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全面认识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价值、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逻辑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创新要素的流动性，本文在使用熵权 TOPSIS 法综合评价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四大经济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上，



基于 2000 — 2019 年间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将空间因素纳入模型当中，利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从溢出效应视角分析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据实证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 一、文献综述

高校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高校中从事知识创造、技术研发的相关人员为主体，利用与整合企业、政府、金融、中介组织等相关机构与组织的资源与功能，以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创造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为目标的一种创造性活动过程及其结果。国内外学者聚焦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测度及其经济发展效应展开了大量研究。比如，雷亚楠等从基础资源投入能力、科研实力、科研能力和科技产出能力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展开了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研究。Goldstein 等提出，高校通过创造人力资本、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共同创造有利环境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省域作为承接经济要素流动的空间载体，在“量”上形成了显著的差异，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对经济协调发展和缩小差距的广泛关注。基于此，学者们展开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及其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比如，覃成林等采用区域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差异三项指标对 2000 — 2010 年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全国四大经济区域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展开了实证研究。近年来，伴随着新发展理念提出和贯彻落实，科技创新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研究认为，科技创新能力的差异既是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可能进一步扩大区域差距。也有研究认为科技创新不仅是促进经济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促使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缩小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能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仍存争议。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多基于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视角，而鲜有将高校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分别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和目标函数，探究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此外，相关研究对细分尺

度的精细刻画也相对不足。由此，构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析出其分项指标，结合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展开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效应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考虑到创新要素的关联带动性和空间流动性，研究者已经关注并展开高校科技创新自身的空间溢出、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效应的空间溢出等研究，那么上述高校科技创新的特性是否也会引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的空间溢出呢？并且这种空间溢出具有哪些细节特征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纵观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阐释，可归纳为三点共识：首先，建立和强化区域间经济联系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其次，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是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内容；最后，调控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措施。由此，我们认为分析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可以分别聚焦到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差距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作用上，进而构建了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效应机制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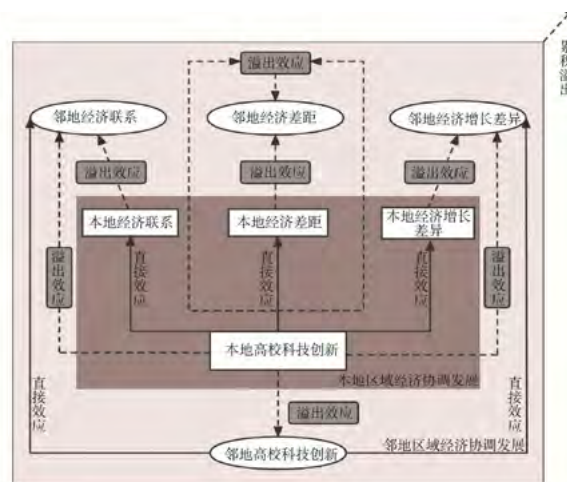


图 1 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效应框架

### （一）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效应

事实上，自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纷纷响应，出台各类政策措施，积极推进这一战略。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大差距，这也决定了各地区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的基础条件以及能力水平并不完全一致。东部相对发达的地区，在人才资源、创新体系以及科技环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无疑有利于创新驱

动战略的落实以及更快的生产率增长,进而可能拉大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当然,落后地区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此次发展契机,一方面努力改善创新环境,加强自身创新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学习先进地区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亦有可能实现对先进地区的追逐与赶超,进而达到经济收敛的目的。

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来看,首先,科技创新可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成本最小化,通过技术研发、技术引进、产品开发、成果转化等方式,形成创新技术与创新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转变,缩小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其次,科技创新能够通过提高地区吸收知识技术溢出的能力和条件,加快区域间知识和技术溢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由此,我们认为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而高校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源泉,我们将研究问题聚焦于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并提出假设 H1。

H1: 高校科技创新会显著正向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即高校科技创新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

## **(二) 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效应的作用机制**

如果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效应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高校科技创新将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呢?基于前文的研究,我们认为高校科技创新可能是通过直接影响“区域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差距”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这三个分项指标来实现的。

从“区域经济联系”分项指标来看,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任何一个创新主体都难以用“单兵作战”的方式掌控所有资源,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协同”等趋势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必然发展方向。高校面临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项目时,往往需要与其他地区或者具有科研优势与丰富科研资源的高校开展创新合作,综合各方拥有的技术、人才、市场、信息等资源优势。与掌握新的知识相比,高校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能更有效地完成创新,因为可以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得技术创新项目的相关数据和资源,并给项目带来新的想法。此外,高水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和复杂性都较高,研发规模大,实验设备昂贵,因此高校间的合

作可以有效降低创新成本。随着基础技术创新重要性的提升，高校突破组织边界，与其他高校进行技术创新合作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区域经济联系也在校际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加强。由此，提出假设 H2。

H2：高校科技创新显著正向影响区域经济联系。

从“区域经济差距”分项指标来看，由于各区域资源禀赋、人文环境及产业基础的不同，一国内部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创新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路径，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创新扩散来实现的。由于区域间存在创新要素的流动性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位势差”，处在创新外围的地区会通过学习和模仿机制获得创新核心区域的知识和技术，使创新外围地区的创新能力得到提高，从而逐渐减少科技创新能力的“位势差”，达到科技创新能力的某种收敛性，进而在一定条件下带动整个区域经济趋于收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3。

H3：高校科技创新显著负向影响区域经济差距。

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项指标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这实际上是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因此，有些区域发展得快，有些区域发展得慢，就形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结构。而在创新赶超效应下，由于科技创新弱势地区的创新模仿成本远远低于科技创新优势地区的自主创新成本，且科技创新弱势地区与优势地区初始创新水平之间的差距越大，意味着可供弱势地区模仿、学习先进技术的选择集也越大，弱势地区就越有可能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获取更多的技术模仿收益，实现科技创新的赶超，缩小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4。

H4：高校科技创新显著负向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 **（三）高校科技创新对邻地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机制**

外溢是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央将创新驱动作为一项政绩衡量标准时，地方政府会创造各种有力条件提高本地科技创新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吸引其他地区的创新资源向本地流动，但是迫于竞争压力，邻地的政府也会积极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从而产生良性互动。这样，本地的创新驱动便会对邻地科技创新产



生影响。此外，本地科技创新还可能会通过自身溢出、创新基础设施共享以及协同创新机制等影响邻地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5。

H5：高校科技创新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地经济协调发展。

###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一)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 1. 指标体系构建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过程的实质在于技术知识的投入产出过程。结合安蓉等人的研究并兼顾数据可得性，本文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构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以期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水平。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数据来源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高校科技创新基础	人力资源条件	专任教师人数(人)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研究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比例(%)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物质资源条件	仪器设备资产总值(万元)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高校科技创新投入	科技人员投入	R&D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科技经费投入	高校 R&D 经费内部支出额占所在区域 GDP 的比重(%)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高校科技创新产出	著作论文	科技著作数(部)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科技论文数(篇)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专利产出	专利授权数(项)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技术转让	技术转让合同金额/千元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专利转让	专利出售合同金额/千元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表 1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测算指标体系

##### 2. 测算方法

为了有效避免使用单一的研究方法所出现的局限性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度，我们基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 2000—2019 年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展开了综合评价。

#### (二)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 1. 空间权重矩阵设置

空间权重矩阵是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合理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是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条件，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分析空间各单元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关联程度。为了研究需要，本文主要从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两个不同角度分别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 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选择方法

首先，使用 Moran's I 系数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其次，对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行 LM 检验和 Robust LM 检验。最后，结合 LR 检验和 Walds 检验判断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能否退化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与误差模型。

## 四、结果分析

### (一)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测算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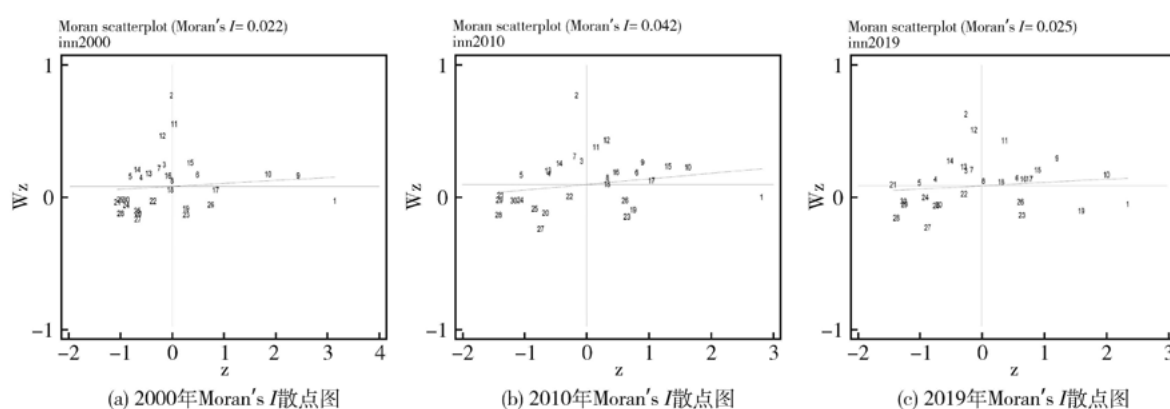
#### 1. 区域特征分析

2000 — 2019 年，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年度均值由 0.078 上升至 0.273，累计增长 250.96%，年均增长 6.83%，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渐进转变倒逼了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将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经济区域展开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测算，结果显示：四大地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年度均值呈现整体上升态势。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增长幅度最大，累计增长 276.76%；其次为中部地区，累计增长 267.15%；东北部地区累计增长 242.59%；而西部地区改善幅度最低，累计增长 238.17%，即出现“西部短板”现象。

#### 2. 时空格局分析

(1) 在时间演化上，2000 — 2019 年东、中、西和东北部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年度均值较基期相比均有所上升。(2) 在空间格局上，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实力关系密切，高校科技创新优势区域也是经济发达区域，表现在东部经济增长强劲地区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也较为突出。(3) 在空间聚类上，选择 2000、2010 和 2019 年三个时间截面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利用局部 Moran's I 系数绘制 Moran's I 散点图，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以看出，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局域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大部分省份位于第三象限，即低值与低值集聚(LL)区域。2000 年，HH(高值与高值集聚区)和 LL 型省份的数量分别为 5 个和 10 个；

图2 2000、2010和2019年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Moran's I 散点图



2010年，HH型地区增加了5个，LL型地区减少了1个，表明2000—2010年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增强；与2010年相比，2019年HH型地区数量减少了1个，LL型地区保持不变，表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间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差异程度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

## （二）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 1. 模型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基于前述研究，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对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是否协调的分析和判断，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义为在区域开放条件下，区域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差异趋于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渐进收敛的过程，并将被解释变量解析为三个分项指标，即区域经济联系（er）、区域经济差距（ed）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ef）。我们利用熵权法进一步对指标进行了赋值，测算出*i*区域和*j*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P_{ij}$ ，并利用期望求值法确定*i*区域在*t*年度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ec）。限于文章篇幅，指标具体设计不在此列示。

（2）核心解释变量。高校科技创新能力（inn）。基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利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出了具体数值。

（3）控制变量。人力资本，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征人力资本；物质资

本，采用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城市化率，采用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征城市化率； 对外开放水平，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 基础设施水平，采用省市人均道路面积来表征基础设施水平； 政府干预，采用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表征。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影响数据平稳性，对所有的变量做对数处理。

## 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选择及构建

为获得最优的回归结果，我们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检验并确定了空间面板模型的具体形式。（1）被解释变量  $\ln ec$ ，Moran's I 检验达到 0.01 的显著性水平，LM - error 和 LM - lag 检验均至少在 0.1 水平上显著，LR - lag 和 LR - error 检验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且 Walds 检验在 0.05 水平上显著，因此，我们选择了 SPDM 模型。（2）三项细化指标  $\ln er$ 、 $\ln ed$  和  $\ln ef$  的上述四项检验的结果均显著。因此，三项细化指标最优模型也是 SPDM 模型。最终我们构建了计量模型如下：

$$\ln ec_{i,t} = \mu_i + \rho W \ln ec_{i,t} + \beta_{1ec} \ln inn_{it} + \beta_{2ec} X_{it} + \theta_{1ec} W \ln inn_{it} + \theta_{2ec} W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ln er_{i,t} = \mu_i + \rho W \ln er_{i,t} + \beta_{1er} \ln inn_{it} + \beta_{2er} X_{it} + \theta_{1er} W \ln inn_{it} + \theta_{2er} W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ln ed_{i,t} = \mu_i + \rho W \ln ed_{i,t} + \beta_{1ed} \ln inn_{it} + \beta_{2ed} X_{it} + \theta_{1ed} W \ln inn_{it} + \theta_{2ed} W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ln ef_{i,t} = \mu_i + \rho W \ln ef_{i,t} + \beta_{1ef} \ln inn_{it} + \beta_{2ef} X_{it} + \theta_{1ef} W \ln inn_{it} + \theta_{2ef} W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中： $\mu_i$  为非观测个体固定效应； $\rho$  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项系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beta_1$ 、 $\beta_2$  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X_{it}$  为控制变量； $\theta_1$ 、 $\theta_2$  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两者空间项的回归系数；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 3. 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效应的估计

（1）点估计结果。我们利用 STATA15.0 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进行参数估计。首先，对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强烈拒绝原假设，

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 SPDM 的固定效应检验显示时空双固定效应优于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因此，我们选择时空双固定效应的 SPDM 模型来测度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见表 2。

变量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lnec	lner	lned	lnef	lnec	lner	lned	lnef
lninn	0.007*** (2.631)	0.028* (1.883)	-0.005* (-1.802)	-0.020* (-1.674)	0.009*** (2.854)	0.032* (1.921)	-0.011* (-1.725)	-0.024* (-1.791)
$W \times \lninn$	0.002* (1.812)	0.012 (0.443)	-0.053** (-2.241)	-0.245* (-1.682)	0.005* (1.861)	0.027 (0.834)	-0.067** (-2.171)	-0.268** (-2.433)
$W \times dep.war$	0.003*** (17.140)	0.004*** (17.290)	0.007*** (17.320)	0.005*** (17.220)	0.001*** (17.030)	0.004*** (17.320)	0.013*** (17.180)	0.071*** (17.320)
空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elihood	1623.157	658.175	637.356	656.379	1565.787	649.286	657.778	687.256
$R^2$	0.513	0.526	0.503	0.415	0.478	0.489	0.501	0.493

注：\*\*\*、\*\*、\*分别表示 0.01、0.05、0.1 显著性水平；限于文章篇幅，表中未报告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下同

表 2 空间面板 SPDM 模型估计结果

第一，从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看，高校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lninn 系数为 0.007，空间滞后项  $W \times \lninn$  系数为 0.002，且两者均显著，表明高校科技创新不仅能够显著提高本地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而且对邻地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第二，从高校科技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分项指标看，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对于区域经济联系，lninn 系数为 0.028 且显著，空间滞后项  $W \times \lninn$  系数为 0.012，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能够显著加强本地经济联系，但对邻地未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区域经济差距，lninn 系数为 -0.005，空间滞后项  $W \times \lninn$  系数为 -0.053，且两者均显著，表明高校科技创新能够缩小本地经济差距，同时对缩小邻地经济差距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lninn 系数为 -0.020，空间滞后项  $W \times \lninn$  系数为 -0.245，且两者均显著，表明高校创新不仅能够显著缩小本地的经济增长差异，而且能够缩小邻地的增长差异。研究还发现，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类似。

(2) 偏微分估计结果。在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我们将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联系、区域经济差距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如表 3 所示。

	变量	Inec			Iner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lninu	0.005***	0.002*	0.007***	0.025*	0.008	0.033
		(2.756)	(1.653)	(2.876)	(1.924)	(0.562)	(0.735)
	变量	Ined			Inef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inu	-0.003*	-0.017**	-0.020**	-0.015*	-0.241*	-0.256*
		(-1.866)	(-2.121)	(-2.038)	(-1.699)	(-1.739)	(-1.793)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变量	Inec			Iner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inu	0.007***	0.003**	0.010***	0.028*	0.021	0.049
		(2.839)	(2.094)	(3.158)	(1.892)	(0.828)	(1.429)
	变量	Ined			Inef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inu	-0.006*	-0.025**	-0.031**	-0.017*	-0.212**	-0.229**	
	(-1.787)	(-2.443)	(-2.499)	(-1.712)	(-2.234)	(-1.997)	

表3 空间溢出效应偏微分估计结果

第一，高校科技创新对本地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看：高校科技创新对本地经济联系影响的直接效应估计为 0.025 且显著，表明高校科技创新能够显著加强本地经济联系。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在“开放式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通过合作网络、契约关系和社会关系等与企业、科研机构、政府和中介机构等联结形成协同合作网络，本地经济联系也必然因为协同合作网络的联结愈发紧密。其二，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破解新产品产业化过程中的质量风险、成本风险以及市场壁垒，使得本地高校科技创新要素和产品能够以更快捷的方式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流通与交换，推动本地经济联系的加强。高校创新对本地经济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估计为 -0.003 且显著，表明高校科技创新显著缩小了本地经济差距。原因可能在于：其一，高校创新要素的流动能够促进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有助于本地企业便捷地获取前沿技术信息，提升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其二，高校科技创新能够通过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组合效率、逐渐向外推移生产可能性边界、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以及优化整体经济结构等途径，形成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巨大策动力，有效缩小本地经济差距。高校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的直接估计为 -0.015 且显著，表明高校科技创新能够显著缩小本地经济增长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高校科技创新有效推动了要素使用率的提高且克服了要素收益的递减，由此创新绩效和创新产出得到了提升和改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进



而缩小了本地经济增长差异。 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估计为 0.005 且显著，证实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综上对本地而言，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效应是通过加强经济联系、缩小经济差距与经济增长差异来实现的，表现为“多轮驱动”“协同共进”的显著特征。 由此，H1、H2、H3、H4 均得到验证。

第二，高校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效应的空间溢出。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 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间接效应估计系数为 0.002 且显著，表明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溢出。 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联系影响的间接效应估计为 0.008，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联系存在正向溢出但不显著。 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间接效应估计为 -0.017 且显著，表明高校创新对区域经济差距存在负向溢出。 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的间接效应估计为 -0.241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存在显著负向溢出。 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且这种溢出主要源于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差距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溢出效应。 由此，H5 得到验证。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结论

与以往研究关注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的关系不同，本文把问题焦点放在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协调的关系上，将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展开实证研究，以 2000 — 2019 年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将高校科技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SPDM），考察了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回应了学界对高校科技创新是否显著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关切。 主要结论为；（1）高校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即能够增强区域经济联系、缩小区域经济差

距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2）高校科技创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依赖本地高校科技创新对邻地经济差距和经济增长差异的显著作用。

## （二）政策建议

（1）各地方政府充分利用自身的高等教育资源，把高校科技创新视为促进本地经济协调发展的可靠政策工具。第一，政府应牵头组织跨区域的高校协作，提高科技创新基础条件，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使高校科技创新能够成为本地经济协调发展可以长期依赖的重要路径。第二，政府应助力高校科技创新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便捷流动，利用创新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创新收敛，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2）大力加强构建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机制。第一，构建高校科技创新本身的空间溢出机制，促进邻地经济协调发展，缩小邻地经济差距与经济增长差异。具体而言，通过构建跨区域的开放协同创新网络，共享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产品市场，消除创新要素在区域间流动的壁垒，发挥科技创新优势高校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邻地高校科技创新发展。第二，加快高技术产业创新向中低技术产业转移和扩散。由于高校科技创新有助于本地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并通过本地向邻地转移和扩散，带动邻地中低技术产业资源配置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邻地经济协调发展。第三，推动本地与邻地高校的协同创新，加快绘就高校科技创新深度参与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版图。

作者简介：黄艳，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薛晨晖，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灏，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我院周洪宇院长受邀参加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建系一百周年系列讲座

2024年6月24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举办“教育学科的发展历史与未来展望”系列讲座第4讲，以庆祝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建系一百周年及教育学科建立122周年。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受邀担任主讲嘉宾，并以“郭秉文与现代中国教育研究新范式的开启”为题作主题讲座。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教授担任主持人，吸引了广大师生和研究者参与。



周洪宇教授与北京大学师生交流探讨

讲座围绕郭秉文先生在现代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贡献展开，聚焦于其在实证量化研究范式，哲学思辨研究范式和教育历史研究范式方面的创新。讲座伊始，周洪宇教授以对郭秉文和与郭秉文同时代的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教育学人的介绍引入，指出郭秉文对桑代克、杜威、孟禄等西方教育界大家教育范式的学习、

移植和中国化；强调郭秉文是中国现代教育学科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引进、传播并结合中国实际改造了西方的教育学说，对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后，周洪宇院长以郭秉文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为基础，结合 20、21 世纪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从五个方面深入探讨了郭秉文与中国教育研究新范式的开启过程。第一，与科学结盟：由桑代克到郭秉文对现代中国教育实证量化研究范式的开启。第二，重哲学思辨：由杜威到郭秉文对现代中国教育哲学思辨研究范式的开启。第三，扎根中国问题：由孟禄到郭秉文与现代中国教育历史取向研究范式的开启。第四，奠基未来：郭秉文开启中国教育研究新范式之功。第五，未来路径：郭秉文开启中国教育研究新范式的启示。随后，周洪宇院长与北京大学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和交流。

本次讲座旨在揭示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为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激发更多研究者对中国教育学科的热爱和关注，共同推动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



## 我院院长周洪宇教授和博士生常顺利合作的 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

近日，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和2022级博士生常顺利合作撰写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等教育的未来图景、潜在风险及其治理》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24年第4期全文转载，文章原刊于《现代教育管理》2023年第11期。



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RUC

### 论文转载证明

周洪宇/常顺利同志发表于《现代教育管理》2023年第11期的文章《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等教育的未来图景、潜在风险及其治理》已全文转载于我中心编辑出版的期刊《高等教育》2024年第04期。

特此证明。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室



2024年6月26日  
总编室



在线查验证明真伪：  
1.打开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人大复印库”  
2.使用小程序“证明查验”功能扫描二维码，在线验证(包含作者简介)  
3.只能通过以上步骤查验，其他方式无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59号文化大厦13-14层 通信地址：北京9666信箱 邮编：100086 电话：(010) 62515819 <http://www.zlzx.org>



## 主要观点如下：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验证了一种人工智能开发的技术路线，这一技术“可能使人类从此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在智能时代来临之前，要在认识 GPT 系列系统的智能原理与学习过程基础上，未雨绸缪，规划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智能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教育治理、师生关系等方面改变高等教育生态；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大学生学术精神异化、学生隐私安全受到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新挑战、大学生创新能力弱化、师生关系异化、大学生就业市场遭受冲击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从涵养大学生学术精神、推进人工智能法治化建设、创新“大思政课”方式、创建以“人”为本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人师—机师—学生”三方协同新生态、深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等方面着手化解生成式人工智能为高等教育生态带来的潜在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基于学术评价标准的复印报刊资料二次文献转载，被学术界和期刊界视为人文社科领域中客观公正、影响广泛的学术评价标准之一。此次，周洪宇教授和常顺利博士的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这不仅意味着该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获得国内学术界的认可，同时，也体现了我院近年来在学生培养方面的显著成效，以及在学术前沿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影响力。



## 申国昌教授和博士生白静倩合作的论文 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

我院执行院长申国昌教授和博士生白静倩合作的论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基础、内在逻辑和提升路径》，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



### 论文转载证明

申国昌/白静倩同志发表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12期的文章《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基础、内在逻辑与提升路径》已全文转载于我中心编辑出版的期刊《高等教育》2024年第05期。

特此证明。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室



## 主要观点如下：

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国高等教育悠久的历史传统，从古代商周时期的教育萌芽，到西周的完备学校制度，再到先秦的官私学互补格局，以及后世各朝代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如汉代太学的创立、唐代书院的兴盛等。这些历史积淀不仅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改革，为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文章还深入剖析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内在逻辑。这种自信来源于对古代高等教育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与继承，对近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历史的理性总结与反思，以及对党领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百年探索经验的充分肯定。同时，文章还指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是在对高等教育理论的反思与建构、对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建制以及对高等教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逐步形成的。这种自信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

针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发展，文章提出了明确的提升路径。首先，要坚定历史自信，明确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定位，充分认识其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其次，要筑牢理论自信，优化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引领，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同时，还要夯实制度自信，巩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基础，建立健全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最后，要厚植文化自信，增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自觉，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和精神，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注入强大的文化动力。

## 刘来兵教授与硕士生杨若怡合作论文 被《教育学文摘》摘编

近日，长江教育研究院刘来兵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 2022 级硕士生杨若怡合作撰写的《基础教育学校数字化治理的涵蕴、表征与路径》一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文摘》2024 年第 2 期摘编，文章原刊于《现代教育管理》2024 年第 1 期。

季刊·2024 年第 2 期

- 61 数字化技术赋能教师有意义评价的逻辑架构与生成机制  
陈思伦、吴南中
- 64 教师工作负荷的生成机理、异化表征及调治向度  
赵 岚、李 燕
- 66 乡村青年教师“内卷”与“躺平”：为何与何为  
刘 佳、刘雅洁
- 68 AIGC 时代职业教育教师智慧学习空间的设计框架与构建策略  
谢晓雪、柳士彬
- 71 产教融合背景下产业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保障  
全劲彪、孙丽珍
- 74 高职学生实习结构化转向：现实归因、逻辑框架与推进策略  
邓 卓
- 德育探析**
- 76 培育国家忠诚与构建人类情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双重使命  
叶 飞
- 79 中国式具身爱国：政治传统、价值意蕴及教育路径  
翟敬斌
- 81 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价值意涵、现实境遇与实践向路  
闫守轩等
- 教育管理**
- 84 新时代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水平测度与均衡演进  
蔡 和奇
- 87 基础教育学校数字化治理的涵蕴、表征与路径**  
刘来兵、杨若怡
- 90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变革探究  
刘献君
- 92 科教融汇视域下高职院校校企协同创新治理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张莉霞等
- 95 我国社区教育治理结构演进路径及其多元治理体系构建  
沈光辉
- 教育史研究**
- 97 百年学术史观照下的中国成人教育研究  
乐传永、叶长胜
- 100 赫尔巴特运动在日本  
陈露茜、蔡一诺
- 103 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缘起、内涵与当代价值  
吴雪萍、裴文洁
- 比较教育**
- 106 从国际经验到本土实践：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破局之法  
王佑镁等
- 108 日本政府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路径、成效及思考  
李冬梅
- 110 德国普通教育学的概念审议与价值论证  
孙元涛、邵晓迪

出版日期：季末 18 日

印 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2-683

订 购：全国各地邮局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市场部

订购电话：(010)82503412/38/39/40

(010)82503029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人大支行

户 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账 号：344156031742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广告热线：(010)62514919

广告发布登记证：

京新市监广登字 20170128 号



微信服务

3



## 主要观点如下：

教育数字化的迅猛发展为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念引导和技术支持。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学校的治理能力，发挥学校在课程开发、教学设计、师生管理、综合评价等方面的主体作用，促进教育数字化与学校治理的有机结合。当前基础教育学校治理的数字化发展存在基建不完善、数据安全系数低和整体联通不畅等问题，需采取政府元治、多元共治、学校自治、厉行法治等多重路径实现学校数字化治理，为教育强国建设发挥基础教育的基点作用。

《教育学文摘》致力于精选优秀论文、摘编前沿观点、关注教育热点、荟萃研究精华，在教育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此次，刘来兵教授和杨若怡硕士合作的文章被《教育学文摘》摘编，体现了研究院研究团队对于学校治理研究以及数字化转型等理论前沿和实践需求的精准把握，未来我院将继续深化对教育治理、教育数字化等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优质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17多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奉献力量。自2016年来，连续三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排名稳扎前三。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y2006@cjy.com.cn](mailto:cjy2006@c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y.com.cn/>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277号湖北教育出版社5楼